

# 中国居民收入流动性的新趋向研究

陈宗胜 杨希雷

**【摘要】**文章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0~2018 年数据,系统研究了中国居民收入流动性程度、方向、趋势、合意性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从绝对收入流动指标来看,中国居民收入流动性整体呈下降趋势,在考察期内下降 30.68%;从流动性质量来看,考察期内向上流动大于向下流动,总体上是合意的。收入流动能够促进收入均等化,但其作用随时间逐渐降低。结构分解表明,在增长、分布、交换三类流动中,交换流动对总流动性的贡献最大,决定着总流动性的变化;增长流动次之,分布流动最小。子群分解表明,低收入群体的流动性对总体流动性贡献最大,中等群体次之,但均呈下降趋势,而高收入群体流动性最低,地位趋于固化。家庭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量、体制内就业、工资性收入比重均有利于居民向上流动;城镇居民和东部地区居民向上流动的可能性相对较高;期初收入较高或家庭规模较大的居民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较小。

**【关键词】**收入流动性 流动性分解 收入差距 共同富裕

**【作者】**陈宗胜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讲席教授;杨希雷(通讯作者)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当前,中国进入推动全面共同富裕的新时代。实现全面共同富裕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使更多人享有致富的机会。在经济学理论中,收入流动性是指一定社会中个体或家庭的收入位次、收入水平所处的群体或阶层变化,收入流动性对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收入流动性充分,意味着社会成员相对收入地位的变动概率较大,即使在短期内收入差距较大,不同阶层间充分的收入流动性可能快速减小收入差距。从不同群体间收入流动性的视角,能够测算不同收入阶层之间转换的可能性,识辨影响社会机会均等的机制,从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虽然有所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这与各阶层居民的收入流动性有关。为此,本文着重考察中国现阶段收入流动性特征,从流动程度、方向、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系统剖析收入流动性现状,探讨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

## 一、既有研究发现

关于收入流动性的研究最早由 Prais(1955)提出,之后大量学者在这一领域进行了

深入研究和探讨。早期研究主要关注测算方法及少数发达国家的案例,近十几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大型跟踪调查的实施和数据积累,有关中国收入流动性的研究开始逐步增多。概括起来,现有研究主要涉及以下3个方面。

一是收入流动性水平和变动趋势。现有研究主要考察了城乡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差异。研究发现,从收入流动性水平上看,农村大于城镇,这主要因为农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且不稳定(王朝明、胡棋智,2008)。从变动趋势来看,城镇居民收入流动性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呈上升趋势,但之后开始进入下降通道(杨穗、李实,2016),其原因主要与经济调整有关,如全面市场化改革加快了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但后期随着企业改制和减员增效,收入差距逐渐扩大,高收入家庭经济地位的不断巩固,城镇居民收入的向上流动性降低。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也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严斌剑等,2014;朱诗娥等,2018),但受收入结构、家庭规模等因素的影响,农村收入流动性的变化更复杂。在2010年之前,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大致呈上升趋势,新农村建设的开展(权衡,2015)、三农支持力度的加大(牛晓健,2014)、劳动力转移等因素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增强了农村家庭的收入流动性。2010年以后,由于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加之农村再分配力度小于城镇(郭庆旺等,2016),社会福利保障水平低,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呈下降趋势。

二是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因素。在农村地区,严斌剑等(2014)、朱诗娥等(2018)、黄宏伟和胡浩钰(2019)、彭澎和周力(2022)研究发现,个体受教育水平、家庭人口结构、政府补贴、税费减免、社会资本、土地转包、非农就业和数字金融发展等因素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流动性有明显影响。在城镇地区,王晓和董长瑞(2013)、康书生和袁薇(2021)研究发现,家庭收入结构、人口结构、劳动力就业特征、家庭金融可得性等因素对居民收入流动性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全面层面来看,王洪亮等(2012)、臧微和白雪梅(2015)、张子豪和谭燕芝(2018)、韩长根和张力(2019)发现,家庭收支结构、职业特征、社会保险和互联网普及等因素对居民收入流动性有显著影响,而税收负担对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及阶层异质性(崔景华、谢远涛,2022)。

三是收入流动性对不平等的影响。收入流动性提高有利于长期分配平等化和社会福利的改善(周兴、王芳,2010;权衡,2015)。比较来看,绝对收入流动有助于降低中长期的绝对收入不平等,相对收入流动则倾向于加剧相对收入不平等(程小纯、龙莹,2014)。收入流动性的下降抑制了长期收入的平等化(张立冬等,2015)。也有研究认为,收入流动性的变化不一定能有效改善收入不平等。如尚娟和王璐(2013)、洪兴建和马巧丽(2018)等研究表明,收入流动作为长期收入不平等的改进器,不一定总能发挥作用。

总之,国内学术界关于居民收入流动性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对于收入流

动性的量化研究主要侧重于流动性程度的度量 and 趋势分析,且以相对流动为主,对居民收入的绝对流动研究较少,未涉及流动性质量是否合意;其次,除整体流动性状况外,目前学术界较少关注不同群体内部及群体间的流动性,以及相应流动性对全社会整体收入流动性的贡献;再次,现有研究所涉及资料大都是 2010 年之前的,对进入经济新常态后的流动性情况尚无更新研究。鉴于此,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2010~2018 年调查数据,从绝对流动的角度考察中国居民收入流动性程度、结构和质量,分析其均等化效果的最新趋势及不同群体流动性的贡献。

## 二、收入流动性测度方法、指标选择及统计特征

### (一) 收入流动程度的测度模型

本文重点关注居民收入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跨期变动程度。为更全面地考虑居民福利的变化,借鉴 Fields 等(1996、1999)提出的绝对流动性指数测度收入流动程度,具体如下:

$$M_1(X, Y) = \frac{1}{n} \sum_{i=1}^n |\log y_i - \log x_i| \quad (1)$$

其中,  $X=(x_1, x_2, \dots, x_n)$  为期初收入分配向量;  $Y=(y_1, y_2, \dots, y_n)$  为期末收入分配向量;  $n$  为期初和期末的样本容量;  $M_1$  为收入流动程度指标。该指标考虑了每个居民或家庭收入绝对量的变动,指标取值越大,表示收入流动性越大。

### (二) 收入流动性质量的测度方法

依据 Alborno 等(2007)提出的研究框架,如果一个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对于前一期有提高,且提高的幅度大于所有家庭收入变动幅度的均值,同时在家庭收入排序中(从低到高)该家庭的收入等级有所提高,则认为该家庭向上流动,属于正向流动,其数学形式表示为:

$$\Delta X_{it} > 0, \Delta X_{it} > \frac{1}{n} \sum_{i=1}^n \Delta X_{it}, R_{it} > R_{it-1} \quad (2)$$

其中,  $\Delta X_{it}$  代表  $i$  家庭在  $t$  期相对于  $t-1$  期的收入变化,  $R_{it}$  代表  $i$  家庭在  $t$  期的收入排序,  $n$  为家庭样本总数。

向下流动指的是,相对于上期而言家庭人均收入下降,且家庭人均收入的绝对变动小于所有家庭收入变动的均值,同时家庭收入等级在所有家庭中排序(从低到高)下降,属于负向流动,其数学形式表示为:

$$\Delta X_{it} < 0, \Delta X_{it} < \frac{1}{n} \sum_{i=1}^n \Delta X_{it}, R_{it} < R_{it-1} \quad (3)$$

除上述两类情况以外,其他情况定义为相对不流动。本文使用向上流动概率与向下

流动概率的比值衡量收入流动的质量。

(三) 收入流动性均等效应的测度方法

Fields(2010)构建了一个“作为收入平等器的流动性指数” $E(e\text{-qualizer})$ ,用以测度收入流动性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E=1-\frac{I(\bar{X})}{I(X)} \tag{4}$$

其中, $X$  为期初收入分配向量, $\bar{X}$ 为长期平均收入分配向量,即期初收入与期末收入的均值, $I$  是符合洛伦兹准则的不平等度量指标,本文采用基尼系数。式(4)的经济含义和性质: $E>0$  表明居民长期收入不平等程度小于短期不平等程度,即收入流动性有利于长期收入均等化;反之,亦反之。

(四) 收入流动性的分解模型和方法

早期研究者多侧重结构分解,本文除使用结构分解模型外,还引入群层分解方法,尝试从多个角度探讨影响收入流动性程度、质量及分配结果的原因。

1. 结构分解模型。Van Kerm(2004)提出总体流动性可分解为 3 个部分:重新排位带来的交换流动、经济增长带来的增长流动和收入再分配带来的分布流动。其中,交换流动是指在收入分布不变的情况下,社会成员间收入地位的相对变动对流动性的影响;增长流动反映社会成员整体收入水平的上升或下降对流动性的影响;分布流动指在不改变排序的情况下,总体收入在个体之间的再分配,反映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变动对流动性的影响。增长流动和分布流动合称为结构性流动。

分解流动性的关键在于构建两个“反事实”收入分布。假设期初收入分布从(3,2,1)变为期末的(5,6,7)。首先,将交换效应从绝对收入流动中分离出来,由于期末各成员的收入排序为升序,则反事实收入分布  $E$  就是期初收入分布按升序重新排序后得到的收入分布,即(1,2,3);其次,分解收入增长效应,由于期初和期末的平均收入水平分别为 2 和 6,于是反事实收入分布  $D=(6/2)*E=(3,6,9)$ 。在获得  $E$  和  $D$  这两个反事实收入分布的基础上,可以求得交换流动、增长流动和分布流动,计算公式为:

$$M_1(X,Y)=M_1(X,E)+[M_1(X,D)-M_1(X,E)]+[M_1(X,Y)-M_1(X,D)] \tag{5}$$

其中, $M_1(X,E)$ 表示交换流动, $M_1(X,D)-M_1(X,E)$ 表示增长流动, $M_1(X,Y)-M_1(X,D)$ 表示分布流动,各部分的具体计算同式(1)。

2. 子群分解模型。子群可分解性(Subgroup Decomposability)是指总收入流动性可分解为不同群体流动性的加权和,据此可以详细考察不同收入群体间的流动性对总体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和贡献。由于不同群体收入向上或向下流动的概率不同,为了区分这种方向上的差别,需要引入 Fields 等(1999)的另一个绝对收入流动性指标:



$$M_2(X, Y) = \frac{1}{n} \sum_{i=1}^n (\log y_i - \log x_i) \tag{6}$$

这里  $M_2$  指标定义的流动性被称为有方向的收入流动,各变量含义与式(1)相同。

子群分解的具体方法如下:将样本总体划分为  $s$  个子群,第  $j$  个子群的单位数为  $n_j$ ,

且  $\sum_{j=1}^s n_j = n$ 。对于所有的  $X^j, Y^j \in R_{++}^{n_j}$ ,有:

$$M_2((X^1, \cdots X^s), (Y^1, \cdots Y^s)) = \sum_{j=1}^s \frac{n_j}{n} M_2(X^j, \cdots Y^j) \tag{7}$$

### (五) 收入流动影响因素的分析模型

与以往研究主要解释收入位置或水平变动不同,本文从收入流动性质量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居民家庭收入位置和收入水平的变化,通过计量检验讨论居民家庭收入流动的影响因素。根据研究目的和资料可得性,采用 Multinomial Logit 模型考察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因素,模型设定为:

$$\text{logit}(Mo) = \alpha + \beta' X_i' + \gamma_j \Delta X_i + \varepsilon_i \tag{8}$$

其中,  $Mo$  为被解释变量,代表居民家庭收入的跨期变动。根据前述流动性质量的定义,如果一个家庭实现了向上流动,  $Mo$  取值为 1;如果某一家庭向下流动,  $Mo$  取值为 -1;上述两类以外的其他情况定义为相对不流动,  $Mo$  取值为 0。式(8)中,  $\alpha$  为常数项向量。  $X_i'$  为不随时间变化的向量。  $X_i$  为随时间变化的向量,  $\Delta X_i$  是对时间序列向量  $X_i$  的一阶差分。

### (六) 收入流动性影响因素的代理指标选择

影响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因素大致可归为两类:收入因素和支出因素。首先,从收入角度看,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社会资本、就业类型、户籍所在地和家庭规模均有可能影响收入流动性。

人力资本是影响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而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是人力资本大小的直接体现,通常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越高,获得高收入的机会越大,收入增长越快,家庭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也越大。作为市场机制的一种补充,社会资本在提高个人和家庭收入、改善收

表 1 家庭人均实际收入水平及增长率

	2010 年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	2018 年
全体居民					
均值(元)	8858.38	10896.00	12509.83	17221.13	20118.10
增长率(%)		23.01	14.81	37.66	16.82
城镇居民					
均值(元)	12610.70	14728.22	17455.55	22780.14	28105.47
增长率(%)		16.79	18.52	30.50	23.38
农村居民					
均值(元)	6028.44	7827.35	8451.11	12131.22	13469.10
增长率(%)		29.84	7.97	43.55	11.03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整理。

注:增长率是指收入相对于前一个时间点的增长率。

人分布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家庭人均收入变动与家庭人口规模和劳动力就业质量密切相关。家庭人口规模的扩大可能降低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意味着家庭成员人均资本量或禀赋更少,不利于家庭实现收入向上流动。中国不同劳动力市场工资价格存在明显差异,与民营经济相比,公有制经济单位就业的收入、保障、社会地位等存在明显优势。户籍和居住地的不同反映了中国城乡和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刘志国、刘慧哲,2021)。其次,从支出角度看,家庭的支出水平和支出结构不同,由此可能影响家庭收入流动性的跨期变动(臧微、白雪梅,2015)。本文重点关注医疗和教育培训这些具有明显刚性特征的支出。家庭成员在成为社会所需劳动力前需要花费大量教育成本,进行各种知识和技能的培训,而且此类培训和学习的时间较长,可能影响家庭收入的跨期变化;此外,所有家庭成员特别是年老家庭成员必然面临医疗健康的需求。这两项支出及其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家庭收入的跨期变动。

综上,式(8)中  $X'$  包括期初收入水平、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劳动力平均年龄及其平方、体制内工作的家庭成员比重、家庭社会资本及家庭地理位置等; $X$  包括家庭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以及教育培训支出、医疗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重及家庭规模等随时间变化的因素。

(七) 统计数据及描述性统计特征

本文所有统计指标和数据均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y, CFPS) 2010~2018 年的 5 轮调查。相比其他数据库,CFPS 数据样本量大,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和时效性。本文仅保留连续追踪 5 轮调查的家庭,并剔除家庭收入缺失的样本。<sup>①</sup>经过清

洗,最终获得有效追踪样本 5 760 户,本文分析样本为这些家庭户的追踪调查记录形成的平衡面板数据。<sup>②</sup>表 2 给出了 2010~2012 年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 2 可以看出,居民收入流动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 0.040

表 2 2010~2012 年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变 量	均值	标准差	变 量	均值	标准差
收入流动	0.040	0.865	工资收入比重变动	-0.045	0.530
期初收入对数	8.574	1.082	转移收入比重变动	0.073	0.346
劳动力平均年龄	47.10	12.19	教育支出比重变动	-0.004	0.135
家庭规模变动	0.167	0.803	医疗支出比重变动	-0.021	0.191
体制内就业比重	0.124	0.113	城镇	0.430	
平均受教育年限	5.884	4.101	东部	0.420	
礼金支出对数	7.115	1.215	中部	0.296	
参加组织比例	0.195	0.279	西部	0.284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计算整理。下同。

① 李莹(2019)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收入流动应该是同一组样本在连续考察期内收入的持续变化情况,否则样本的不规则进出对流动性测度的影响可能较大。  
② 为确保不同年份之间收入可比性,本文分别根据各省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各年度名义收入调整至 2009 年的价格水平。各省历年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自于 EPS 数据平台。

和 0.865,意味着整体向上流动的家庭数量大于向下流动的数量,但不同家庭的流动差异较大。后文将通过实证分析解释这一差异。其余变量的情况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

### 三、2010~2018 年中国居民收入流动性特征

#### (一) 居民收入流动性程度和结构状况

利用前文介绍的绝对收入流动指标  $M_l$  和结构分解方法,本文使用式(1)和式(5)对 2010~2018 年中国居民家庭的绝对收入流动性进行了测度和结构分解,计算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2010~2018 年中国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水平和结构分解

	2010~2012 年		2012~2014 年		2014~2016 年		2016~2018 年	
全体居民								
总流动性	0.9201	100%	0.9061	100%	0.7892	100%	0.6378	100%
交换	0.8085	87.87%	0.8853	97.70%	0.8129	103.00%	0.5995	93.99%
增长	0.0525	5.71%	0.0180	1.99%	0.0385	4.88%	0.0348	5.46%
分布	0.0591	6.42%	0.0028	0.31%	-0.0622	-7.88%	0.0035	0.55%
城镇居民								
总流动性	0.8237	100%	0.8220	100%	0.7006	100%	0.5928	100%
交换	0.7379	89.58%	0.8141	99.04%	0.6974	99.54%	0.5374	90.65%
增长	0.0506	6.14%	0.0265	3.22%	0.0508	7.25%	0.0423	7.14%
分布	0.0352	4.27%	-0.0186	-2.26%	-0.0476	-6.79%	0.0131	2.21%
农村居民								
总流动性	0.9928	100%	0.9735	100%	0.8618	100%	0.6790	100%
交换	0.8465	85.26%	0.9498	97.57%	0.9174	106.45%	0.6589	97.04%
增长	0.0644	6.49%	0.0084	0.86%	0.0255	2.96%	0.0271	3.99%
分布	0.0819	8.25%	0.0153	1.57%	-0.0811	-9.41%	-0.0070	-1.03%

从表 3 可以看出,总体样本的绝对收入流动性指数  $M_l$  在考察期间的四个时间段内分别为 0.9201、0.9061、0.7892 和 0.6378,整体上表现为逐步下降的趋势。从绝对流动性的结构分解来看,交换流动性总体是下降的,从 2010~2012 年的 0.8085 下降到 2016~2018 年的 0.5995,其贡献率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 2016 年之前,交换流动及其贡献持续上升,2016~2018 年出现下降。不过,在任何一个时间段,家庭收入相对位置变化引起的交换流动对总流动性的贡献一直最大,是总流动性状况的主导因素。增长流动对总流动性贡献率虽有波动,但相对比较稳定,特别是 2012 年后其贡献率仅次于交换流动。这表明,整体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对绝对收入流动起到了积极作用。分布流动及其贡献率从 2010~2012 年的 0.0591 和 6.42%分别下降到 2016~2018 年的 0.0035 和 0.55%,不仅整体上下降,而且在 2014~2016 年为负。由于分布流动主要衡量

收入分配中家庭收入的相对大小,其流动性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分配结果的平等性,分布流动下降或为负意味着在家庭收入地位不变的情况下,收入分配份额的变动更多地损害了低收入群体的利益,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流动性可能是比较不合意的。

从表3可以看出,城镇家庭人均收入的绝对流动性不断下降。 $M_1$ 指数从2010~2012年的0.7379逐渐下降到2016~2018年的0.5374。其中,交换流动从0.7379下降到0.5374,但对总流动的贡献率基本保持在90%左右,是城镇收入总流动性的主导因素。增长流动从0.0506下降到0.0423,总体呈波动下降,在家庭平均收入较高时,增长流动对总流动的贡献较大。分布流动从0.0352下降到0.0131,且在中间两个时段为负。究其原因,城镇居民家庭收入主要来自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收入,其中工资性收入占六成左右,2010年以来国内经济增长放缓和产业结构调整使城镇就业压力不断增加,居民工资性增长不确定性上升;而同期转移性收入总体上也有所收窄。比如居民养老金上调幅度趋缓,从2010年的10%下降到2016年的6.5%和2018年的5%。这两项主要收入增速的下滑降低了城镇家庭的收入流动性。

农村家庭收入的绝对流动性也呈下降趋势, $M_1$ 指数从0.9928逐渐下降到0.679。从结构分解来看,交换流动从0.8465下降到0.6589,但其对农村收入总流动性的贡献率与城镇一样在2016年前是上升的,交换流动也是农村收入绝对流动的主要部分。增长流动虽有波动,但总体下降,从0.0644下降到0.0271,对农村收入总流动性的贡献率由6.49%下降到3.99%。分布流动同样表现为下降趋势,从0.0819下降到-0.007。与城镇不同的是,农村分布流动在后两个时间段为负。比较而言,同一时间段内农村收入的总流动性高于城市。除了收入基数较低外,城乡家庭收入结构的差异也可以部分解释农村家庭收入流动性更高的原因。农村家庭收入中经营性收入的比例远高于城镇家庭,由于农业生产面临的自然灾害、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均可能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农村居民收入结构2000年以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先占比最大的经营性收入比重不断下降,到2015年工资性收入占比首次超过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村居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外出务工和非农就业有利于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流动性。2011年后伴随着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外出农民工规模增速逐年回落,从2011年的3.4%下降到2018年的0.5%;同期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长率从21%下降到7.9%。<sup>①</sup>结合这些数据,本文认为,严峻的外出就业形势是农村家庭收入流动性下降的重要原因。

总之,无论从总体来看还是从城乡分别考察,居民收入流动性在考察期内都是下降的。总体流动性下降幅度高达30.68%;城镇地区下降28.03%;农村下降31.61%。随着收

<sup>①</sup> 数据来自2011和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入流动性下降,低收入家庭提升自身收入地位变得更为困难。结构分解结果表明,交换流动对总流动性的贡献最大,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总流动性的变动,增长流动次之,分布流动最小。

(二) 居民收入流动的质量合意性

根据式(2)和式(3)计算的家庭人均收入流动方向和流动性质量如表4所示。表4中数据表明,2010~2012年相对向上流动的家庭占全样本的39.51%,不流动的占25.01%,向下流动的占35.48%,收入流动性质量指数为1.11。在随后的两个时间段,流动性质量不断下降,2014~2016年下降到0.88。这意味着这一时期整个社会向下流动的家庭数量大于向上流动的数量。结合前文关于收入变动的分析可知,这一时期的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最快,但从流动性质量来看反而更低,这说明快速经济增长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地位剧烈变动,经济发展的红利并没有惠及更多的社会成员,这一时期的收入差距也有所扩大。2016~2018年流动性质量指数回升至1.17,整个社会向上流动的比例增加到38.1%,向下流动的比例下降到32.57%。从整个考察期来看,家庭收入流动性质量相对较高,向上流动的比例整体上大于向下流动的比例,表明社会分配在考察时期有所改善,但也存在进一步改善的可能。

表4 2010~2018年中国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方向和流动性质量

	2010~2012年	2012~2014年	2014~2016年	2016~2018年	2010~2018年
向上流动(%)	39.51	41.38	29.45	38.10	24.35
向下流动(%)	35.48	40.46	33.32	32.57	11.90
相对不流动(%)	25.01	18.16	37.24	29.33	63.75
流动性质量	1.11	1.02	0.88	1.17	2.05

(三) 收入流动性的均等化效果

表5报告了面板数据全体居民和分城乡的基尼系数。整体来看,全国及分城乡的基尼系数均表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其中全国及城镇的期末值均低于期初,即在考察期内总体上呈波动下降趋势,农村的期末值略高于期初。在所有考察时点,农村的基尼系数均高于城镇。

表5 2010~2018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

年份	全体居民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2010年	0.5145	0.4758	0.4815
2012年	0.5135	0.4869	0.4930
2014年	0.5163	0.4861	0.4881
2016年	0.5154	0.4813	0.4971
2018年	0.5108	0.4610	0.4886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计算整理。

通过比较不同时期基尼系数,本文使用式(4)计算了不同时间段的收入均等化指数,结果如表6所示。从表6可见,中国居民家庭收入均等化指数具有如下特点:(1)各时段内居民的收入均等化效应指数(即E指数)均大于零,表明居民的收入分配状况在任

表 6 2010~2018 年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均等化效果

起始年份	2012 年	2014 年	2016 年	2018 年
2010 年	0.0894(0.4685)	0.0764(0.4752)	0.0643(0.4814)	0.0674(0.4798)
2012 年		0.0886(0.4680)	0.0787(0.4731)	0.0870(0.4688)
2014 年			0.0709(0.4797)	0.0784(0.4758)
2016 年				0.0605(0.484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计算,括号内为长期平均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

看,四个时间段内收入均等化效应 E 指数由早到晚依次为 0.0894、0.0886、0.0709、0.0605,呈明显下降趋势,期末比期初下降了 32.33%。这意味着,虽然收入流动性具有改善不平等的作用,但这种改善的作用不断下降。

(四) 不同群体收入流动性的分解

按收入中位数,本文将样本划分不同收入群体,结合收入分布变动考察不同收入群体的动态演进。具体来说,本文将家庭人均收入位于总体收入中位数 75%~125% 之间的家庭划为中等收入群体,位于中位数 75% 以下的家庭为低收入群体,位于中位数 125% 以上的家庭为高收入群体。据此,根据式(6)和式(7)进行分解,结果如表 7 所示。

首先,无论从整体还是分城乡来看,低收入群体的流动性均为正值,对总流动性的贡献在考察期的各时间段都是最大的。这表明低收入群体有向上流动的趋势,能够享受

表 7 不同收入群体对总体流动性的贡献

时间段	总流动性(M <sub>2</sub> )	低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群体	高收入群体
全体居民				
2010~2012 年	0.2567	0.2785(108.50%)	0.0319(12.43%)	-0.0537(-20.93%)
2012~2014 年	0.1729	0.2930(169.45%)	0.0063(3.65%)	-0.1264(-73.10%)
2014~2016 年	0.3654	0.3721(101.83%)	0.0248(6.78%)	-0.0315(-8.61%)
2016~2018 年	0.2388	0.2064(86.41%)	0.0252(10.56%)	0.0072(3.02%)
城镇居民				
2010~2012 年	0.2227	0.1904(85.51%)	0.0493(22.12%)	-0.0170(-7.63%)
2012~2014 年	0.2320	0.2753(118.64%)	0.0379(16.34%)	-0.0812(-34.98%)
2014~2016 年	0.3697	0.2913(78.80%)	0.0624(16.89%)	0.0159(4.31%)
2016~2018 年	0.2641	0.1464(55.43%)	0.0535(20.26%)	0.0642(24.31%)
农村居民				
2010~2012 年	0.2823	0.3449(122.18%)	0.0188(6.67%)	-0.0814(-28.85%)
2012~2014 年	0.1256	0.3072(244.58%)	-0.0190(-15.10%)	-0.1626(-129.48%)
2014~2016 年	0.3618	0.4383(121.13%)	-0.0061(-1.69%)	-0.0703(-19.44%)
2016~2018 年	0.2157	0.2613(121.15%)	-0.0007(-0.31%)	-0.0450(-20.84%)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计算,括号内为不同收入群体流动性对总流动性的贡献率。

何一个时段内均趋向于更加平等的变化。这意味着家庭收入的增长具有亲贫性,有利于改善长期收入不平等状况,推动收入分配效率与公平的统一。(2)分时间段

到经济发展的红利。这是符合政策旨向的。低收入群体由于收入基数低,较小的收入提升就会带来较大的收入流动性,这也解释了农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流动性较高的原因。例如 2014~2016 年全体居民中,低收入群体的流动性达

0.3721,城镇和农村分别为0.2913和0.4383,均为考察期的最高值,这一时期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幅也最大。考虑到现实中较大的收入差异,低收入群体收入流动性较大,说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表7中任一时段内农村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流动性总是高于城镇,意味着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家庭收入更低、更不稳定。此外,无论从总体还是分城乡看,低收入群体的流动性均呈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总样本中低收入群体的流动性从2010~2012年的0.2785下降到2016~2018年的0.2064,城镇低收入群体从0.1904下降到0.1464,农村从0.3449下降到0.2613。这说明近年来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流动性趋缓。

其次,中等收入群体的流动性不容乐观。从全国总体来看,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流动总体表现为下降趋势,其流动程度及其对总流动性的贡献率分别从2010~2012年的0.0319和12.43%下降到2016~2018年的0.0252和10.56%。其中农村中等收入群体从0.0188和6.67%下降到-0.0007和-0.31%。最后3个时段均为负值,说明农村中等收入家庭向下流动的趋势更为明显,在四个时段内,分别有42.17%、42.13%、42.23%和46.02%的农村中等收入家庭在两年后滑落至低收入群体,而在整个考察期内有48.59%的中等收入者滑落至低收入群体,只有25.43%的家庭上升到高收入群体,其余25.98%仍保持在中等收入群体。相比之下,城镇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流动程度及贡献率持续为正,且在大多时段内都大于农村。城镇中等收入家庭在四个时段内分别有32.16%、29.07%、20.96%和22.01%在两年后下降至低收入群体,整个考察期内有21.15%滑落至低收入群体,另有27.74%保持中等地位,其余51.11%上升到高收入群体。不过,城镇优势也是相对的。从整个考察期来看,城镇中等收入群体对总流动性的贡献在16.34%~22.12%之间小幅波动,这意味着其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

再次,对于高收入群体来说,在考察期的前3个时段内,其收入流动对总收入流动的贡献为负,但在2016~2018年其流动性为正,对总流动性的贡献达到3%。这表明高收入群体对收入总流动性的合意贡献逐渐降低,其收入增长更快。分城乡看,城镇高收入群体对收入总流动性的贡献率在经历最初两个时段负值后转为正值,2014年后其向上流动性超过向下流动。同期农村高收入群体对农村总流动性的贡献率虽然也有波动,但一直为负,说明农村高收入群体相对于城镇更容易向下流动。这一点与基于较早数据的研究发现略有不同,周兴和王芳(2010)使用CHNS 1989~2004年的数据发现,农村高收入阶层家庭向下的收入流动性低于城市的高收入阶层。2010~2018年,虽然农村高收入家庭收入向下流动性也在下降,但持续高于城镇高收入家庭。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是这一时期城镇化的快速推动,以房产、金融资产为主的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大幅提高,特别是城镇高收入家庭凭借初始收入地位的优势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红利,收入地位得以固化。这使得城镇高收入家庭在城镇群体中向下流动的可能性变小,同时其收

入流动性与农村高收入群体的对比也发生了逆转。

总之,不同社会群体流动性的分解结果表明,低收入群体的流动性对总体流动的贡献最大,中等群体次之,但这两类群体的流动性均呈逐渐下降趋势,而高收入群体流动性最低,并且其经济地位趋于固化。

### (五) 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表 8 报告了依据基于多项 Logit 模型的分析结果,以相对不流动为参照组。估计结果表明:(1)家庭特征方面,大多数变量显著且符号符合预期。期初收入对收入向上流动的影响显著为负,对收入向下流动的影响则显著为正,即家庭期初人均收入水平越高,越有利于相对向下流动,同时越不利于向上流动。这说明,收入流动性具有向均衡水平收敛的特征。考察期内家庭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对家庭收入流动的影响在多数时期不显著。家庭规模的变动对收入流动的影响比较明显,家庭人口越多,家庭人均收入相对越少,家庭人均收入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下降,向下流动的可能性则上升。2014 年前体制内就业比重对家庭收入向上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同时降低了收入向下流的可能性,这表明家庭劳动力在体制内部门就业的比例越高,越有助于家庭的收入流动。(2)以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表征的家庭人力资本对促进家庭向上流动或抑制家庭向下流动有显著的影响,说明家庭人力资本是决定收入流动性变动的重要因素。(3)反映家庭社会网络的人情往来支出对家庭向上流动具有积极作用,特别是在 2014~2016 年系数比较显著。参加组织比例的系数对向下流动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向上流动则无显著影响,说明家庭成员参与各类组织的比例越高,越能防止家庭向下流动,但对家庭向上流动的推动作用不明显。(4)工资性收入比重变动的系数表明在家庭总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比上升幅度越大,家庭向上流动的概率越大,向下流动的概率越小。虽然家庭收入来源的多样化降低了工资性收入在家庭可支配收入中的比例,但工资性收入的稳定性对防止家庭向下流动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大环境下,各种风险因素的叠加也使得工资性收入比重的提高有利于家庭收入的向上流动。<sup>①</sup>因此,本文认为工资性收入比重变化对居民家庭收入流动的影响在不同经济环境下的作用是变化的。转移性收入比重变化对收入向下流动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家庭收入中转移性收入比重的提高与其收入向下流动的联系可能是表面性的,因为大多数家庭在获得转移性收入时,往往伴随着从其他收入来源获得的收入减少,所以在提高转移性收入比重的同时必须提高其他来源收入,即保证家庭总收入提高从而促进其向上流动性。(5)教育和医疗支出是当前家庭面临的两大刚性支出。教育支出占比变动大多数时期对向上流动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教育支出比重的提高降低了家庭向上流动的概率。医疗支出占比变

<sup>①</sup> 这一点与杨穗和李实(2016)年基于较早数据的城镇样本所观察到的现象不同。



表 8 居民家庭收入流动影响因素的多项 Logit 模型估计系数(参照组:收入相对不变)

变 量	2010~2012 年 (N=4052)		2012~2014 年 (N=4646)		2014~2016 年 (N=4579)		2016~2018 年 (N=5406)	
	向下流动	向上流动	向下流动	向上流动	向下流动	向上流动	向下流动	向上流动
家庭特征								
期初收入对数	1.077*** (0.064)	0.061 (0.050)	1.002*** (0.052)	-0.073** (0.037)	1.182*** (0.057)	-0.129*** (0.038)	1.040*** (0.052)	0.020 (0.042)
年龄	-0.040 (0.028)	0.039 (0.027)	0.056** (0.027)	0.045* (0.025)	0.008 (0.026)	0.002 (0.024)	0.015 (0.022)	0.010 (0.020)
年龄平方	0.000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家庭规模变动	0.194*** (0.056)	-0.136** (0.055)	0.100* (0.052)	-0.062 (0.050)	0.116** (0.046)	-0.086** (0.042)	0.079** (0.039)	-0.142*** (0.037)
体制内就业比重	-0.439** (0.224)	-0.066 (0.204)	-0.474** (0.225)	0.285 (0.210)	-0.056 (0.674)	0.172 (0.622)	-0.243 (0.530)	-0.220 (0.495)
家庭人力资本								
受教育年限	-0.056*** (0.015)	0.027* (0.014)	-0.080*** (0.015)	0.033** (0.014)	-0.097*** (0.015)	0.069*** (0.013)	-0.098*** (0.013)	0.046*** (0.012)
家庭社会资本								
礼金支出对数	-0.048 (0.040)	0.006 (0.037)			-0.114*** (0.036)	0.131*** (0.033)	-0.007 (0.016)	0.052*** (0.015)
参加组织比例	-0.472** (0.186)	0.221 (0.172)	-0.268 (0.197)	-0.207 (0.191)	-0.704*** (0.203)	0.124 (0.182)	-0.462*** (0.115)	0.084 (0.101)
家庭收入结构								
工资收入占比变动	-0.835*** (0.120)	0.495*** (0.112)	-0.021 (0.013)	-0.005 (0.013)	-0.335*** (0.125)	0.354*** (0.114)	-0.299** (0.116)	0.442*** (0.107)
转移收入占比变动	1.192*** (0.215)	-0.021 (0.213)	1.823*** (0.166)	-0.315** (0.145)	1.037*** (0.190)	-0.048 (0.155)	0.915*** (0.165)	-0.173 (0.149)
家庭支出结构								
教育支出占比变动	0.160 (0.343)	-1.019*** (0.304)	0.287 (0.366)	-0.450 (0.344)	0.876** (0.347)	-0.813*** (0.298)	0.444 (0.271)	-0.452* (0.249)
医疗支出占比变动	0.312 (0.242)	-0.066 (0.218)	0.049 (0.249)	0.225 (0.232)	0.268 (0.211)	0.007 (0.179)	0.536*** (0.170)	0.092 (0.171)
家庭居住地								
城镇	-0.359*** (0.105)	0.160* (0.096)	-0.336*** (0.101)	0.175* (0.095)	-0.556*** (0.090)	0.249*** (0.084)	-0.587*** (0.084)	0.268*** (0.077)
东部地区	-0.244** (0.114)	0.213** (0.106)	-0.182 (0.112)	0.467*** (0.106)	-0.285*** (0.103)	0.128 (0.097)	-0.403*** (0.095)	0.101 (0.088)
中部地区	-0.179 (0.116)	0.088 (0.109)	0.269** (0.115)	0.405*** (0.112)	-0.066 (0.105)	0.045 (0.099)	-0.153 (0.097)	-0.056 (0.092)
截距	-7.100*** (0.820)	-1.010 (0.735)	-8.357*** (0.777)	0.038 (0.669)	-8.633*** (0.805)	-0.270 (0.688)	-8.666*** (0.716)	-1.049* (0.621)

注:2012 年无礼金支出。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动的系数在大多数时间并不显著。(6)由于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基于比较优势向收益率高的区域集聚,收入分配上总体上有利于城镇和发达地区,因而家庭居住地差异对流动性的影响也比较明显。城镇户籍对向上流动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对向下流动的回归系数则为负。这表明家庭在城镇就业机会更多、收入相对较高,能够更好地提升向上流动的概率,同时对向下流动起到缓冲作用。类似地,相比于西部地区,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家庭向上流动的概率更高,向下流动的概率更低。而中部地区的优势不明显,除 2012~2014 年外,其他时间对家庭收入流动的作用均不显著。

#### 四、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 CFPS 2010~2018 年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 2010 年以来中国家庭收入流动的新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1)中国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自 2010 年以来总体呈逐步下降的趋势,在考察期内下降幅度达 30.32%,这对推动共同富裕、畅通向上流动通道提出了挑战;收入流动性质量在整个考察期内从 1.11 提高到 1.17,总体来看,收入流动性质量是合意的。(2)低收入群体的流动对总流动的贡献最大,中等群体次之,但均呈下降趋势,而高收入群体的流动性对总流动的贡献率由负转为正,其地位有所固化。(3)收入流动性的增强能够促进长期收入均等化,但这一作用在考察期逐渐下降。(4)从影响因素看,家庭人力资本的提高、体制内就业规模的扩大、社会资本量的增加、工资性收入比重上升、城镇和东部户籍均有利于收入向上流动,而期初收入越高、家庭规模增大、教育支出增多等变化均可能对居民向上流动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收入流动性程度、方向、趋势及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社会机会公平程度。考察期间收入流动性减弱意味着居民获取收入的平等化进程减缓。近些年受国际变局及疫情的影响,经济增长相对放缓,居民发展机会相对趋少,国家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从多个维度提高居民收入流动性,从而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1)努力提高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加快建立劳动者工资正常增长的长效机制,鼓励勤劳致富,加大对垄断行业的工资管控;合理界定资本贡献,适当限制资本和财富的集中程度,构建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模式。(2)提高转移支付绩效,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建立动态社会救助机制;破除社会保障的户籍限制,统筹城乡养老、医疗保障制度,提高均等化水平。(3)加快以县域为切入点的城乡融合发展,完善县域产业空间布局,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工业等,培育壮大富民产业,缩小城乡差距。(4)采取更为公平有效的教育政策,促进城乡教育从基本均衡迈向优质均衡;进一步增加基础教育经费,促进基础教育协调发展;提高职业教育水平,加快提升技能型人力资本。(5)适时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标准,完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随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保障能力提升的长效机制;统筹城乡发

展和区域发展,补齐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减轻低收入家庭教育、医疗负担。

#### 参考文献:

1. 陈宗胜、杨希雷(2021):《中国城乡差别状况与加速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理论与现代化》,第5期。
2. 程小纯、龙莹(2014):《中国家庭收入流动性与收入不平等的实证研究》,《财经问题研究》,第9期。
3. 崔景华、谢远涛(2022):《家庭收入流动性分解测度、税收负担及制度改革效应分析——基于家庭微观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南开经济研究》,第2期。
4. 郭庆旺等(2016):《中国政府转移性支出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世界经济》,第8期。
5. 韩长根、张力(2019):《互联网提高了我国居民收入流动性吗?——基于CFPS 2010—2016数据的实证研究》,第1期。
6. 洪兴建、马巧丽(2018):《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及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统计研究》,第4期。
7. 黄宏伟、胡浩钰(2019):《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村家庭收入流动性》,《当代财经》,第12期。
8. 康书生、袁薇(2021):《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9. 李莹(2019):《城乡居民收入流动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研究》,《当代经济科学》,第1期。
10. 刘志国、刘慧哲(2021):《收入流动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路径:基于CFPS数据的分析》,《经济学家》,第11期。
11. 牛晓健等(2014):《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性研究——基于一个新的方法与视角》,《金融研究》,第4期。
12. 彭澎、周力(2022):《中国农村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户的收入流动性影响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6期。
13. 权衡(2015):《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性与长期不平等:实证与比较》,《上海财经大学学报》,第2期。
14. 尚娟、王璐(2013):《基于CHNS数据的城乡居民收入流动性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12期。
15. 王朝明、胡棋智(2008):《中国收入流动性实证研究——基于多种指标测度》,《管理世界》,第10期。
16. 王洪亮等(2012):《中国居民获取收入的机会是否公平:基于收入流动性的微观计量》,《世界经济》,第1期。
17. 王晓、董长瑞(2013):《中国城镇居民的相对收入流动研究》,《经济学动态》,第2期。
18. 严斌剑等(2014):《中国农村人均家庭收入流动性研究:1986—2010年》,《经济学(季刊)》,第3期。
19. 杨穗、李实(2016):《中国城镇家庭的收入流动性》,《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20. 臧微、白雪梅(2015):《中国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区域结构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7期。
21. 张立冬等(2015):《收入差距、收入流动性与收入均等化:基于中国农村的经验分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22. 张子豪、谭燕芝(2018):《社会保险与收入流动性》,《经济与管理研究》,第8期。
23. 周兴、王芳(2010):《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流动、收入差距与社会福利》,《管理世界》,第5期。
24. 朱诗娥等(2018):《中国农村家庭收入流动:1986~2017年》,《管理世界》,第10期。
25. Alborno A., Yanez J. M., Foerster C., et al. (2007), The CK1 Gene Family: Expression Patterning in Zebrafish Development. *Biological Research*. 40(2):251-266.

26. Fields G. S., Ok E. A. (1996), The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of Income Mobi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71(2):349-377.

27. Fields G. S., Ok E. A. (1999), Measuring Movement of Incomes. *Economica*. 66(264):455-471.

28. Fields G. S. (2010), Does Income Mobility Equalize Longer-Term Incomes? New Measures of an Old Concept.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8(4):409-427.

29. Prais S. J. (1955), Measuring Social Mobility.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A (General)*. 118(1):56-66.

30. Shorrocks A. (1978), Income Inequality and Income Mobi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2):376-393.

31. Van Kerm P. (2004), What Lies Behind Income Mobility? Reranking and Distributional Change in Belgium, Western Ger-many and the USA. *Economica*. 71(282):223-239.

### Research on New Trends of Income Mobility of Chinese Residents

Chen Zongsheng    Yang Xilei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data of the CFPS to study the income mobility of Chinese residents, and explores the mobility degree, direction, trend, desirabilit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overall income mobility of Chinese residents measured by absolute income mobility indicators shows a downward trend, with a decrease of 30.68% during the inspection period. The quality of national income mobility is generally satisfactory, as the upward mobility is greater than the downward mobility. Income mobility can promote income equalization, but its role gradually decreases.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shows that among the three types of mobilities, exchange mobility has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 to total mobility and determines the magnitude of changes in total mobility, followed by growth mobility and distribution mobility. Subgroup decomposition shows that the mobility of low-income groups contributes the most to overall mobility, followed by the middle-income group, but they both show a downward trend. The mobility of high-income groups is the lowest and tends to solidify.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family human capital, employment within the state-owned sector, social capital, the share of wage income, urban and eastern residence are all conducive to upward mobility of residents, while the factors such as initial income and family size increase tend to inhibit upward mobility of residents.

**Keywords:** Income Mobility; Mobility Decomposition; Income Gap; Common Prosperity

(责任编辑:李玉柱)